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

——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

于天宇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关键词: 《隆中对》; 诸葛亮; 刘备; 南阳; 战略

中图分类号: K2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4)01-0102-07

《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一篇非常著名的对策,其文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在这篇策论中,诸葛亮在认真、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后,向刘备提出了夺取天下的战略规划,进而对刘备的战略举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隆中对》确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它本身也因此而为史家所措意。

历来学者对《隆中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诸葛亮自身的才能、刘备在实现这一对策过程中的诸多举措和《隆中对》与具体历史事件的契合上。例如,尹韵公讨论了关羽败死与《隆中对》的关系,^[1]朱大渭讨论了《隆中对》与夷陵之战间存在的关联。^[2]他们都认为,刘备死抱着《隆中对》不放,而《隆中对》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很大的冲突,因此,刘备失败是必然的。田余庆在详细考察《隆中对》后提出荆州之争、夷陵之战和北伐等事

件之间的关联,认为刘备并没有执行《隆中对》的战略方针。^[3]杨德炳也讨论了《隆中对》与夷陵之战的关系,他认为,是关羽的莽撞和刚愎自用毁了《隆中对》的战略规划。^[4]

我们不拟孤立地讨论《隆中对》与单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早已为前人所深入探究过了;然而,对于《隆中对》的最后一步宛洛、秦川二策的触发条件“天下有变”中“变”的涵义,前人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综述前人对《隆中对》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天下有变”,并简要对《隆中对》的核心“跨有荆、益”一策之失败,阐发自己的看法。

一、《隆中对》前期方略的分析

《隆中对》原文很长,其前期战略是实现“跨有荆、益”,后期战略则是宛洛、秦川二策,进而兴

收稿日期: 2013-10-21

作者简介: 于天宇(1990-),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研究生。

复汉室。以此而分割,其前期战略的叙述为: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5] 卷35 912}

简而言之,前期战略就是在曹操“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条件下,应该“跨有荆、益”。荆州战略地位重要,益州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更重要的是,荆州牧刘表、驻守在蜀地的刘璋以及驻守在汉中的张鲁都没有能力守住荆州和益州,因此,刘备必须并且也有能力拿下这两个地方。

对《隆中对》发微最有成果者,为田余庆。对于《隆中对》的前期战略,他在《〈隆中对〉再认识》中认为,其实在《隆中对》诞生前七年,鲁肃就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即“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5] 卷54 1268}鲁肃之策,在于孙权先立足江东,尔后夺取荆州和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最后统一天下,成就帝业。由此可见,鲁肃的看法与《隆中对》的基本构思相同。而后来孙刘联盟的形成,也是鲁肃看到天下形势的改变而首先向孙权和刘备提出的。所以,孙刘联盟的创始者应该是鲁肃,而不是诸葛亮。而鲁肃的论断相对《隆中对》而言,实际意义更强,受到的重视也更多。对于荆州问题,田先生从刘备的“弃”进行考察,认定问题不在于刘备之弃荆州,而在于荆州不得不弃。荆州和益州,是不可兼得的。刘备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但是他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于是发动了夷陵之战,最终导致惨败而归,让人唏嘘不已。田先生最后认为,荆州的丢失,不是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是失在东吴已经成为荆州的支配力量之后。诸葛亮当初在《隆中对》对“跨有荆益”不可行的问题上没有作深入细致的考虑,是一个失误;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一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的形势,一变于赤壁之战以后孙权的势力进入荆州,二变于刘备的主力入蜀,三变于关羽失荆州;所以,荆州之失不是因为《隆中对》的问题,而是因为刘备无视已经明朗化的形势造成的。刘备死后,诸葛亮放弃了夺回荆州的想,与孙权重归于好,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跨有荆益”政策也就至此而终了。

二、《隆中对》后期战略的分析

后期战略的叙述为: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5] 卷35 913}

要之,进取之策的必要条件,在于“天下有变”,乘势而动。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前人指出了《隆中对》中的一些缺陷,如没有考虑到孙权的利益、“跨有荆益”于“外结好孙权”不可兼得、对汉中重视不够等等。

尹韵公在《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中认为,刘备手下的谋士如庞统、法正等人曾劝刘备放弃荆州,专心治蜀,走刘邦的老路,但是刘备不听,仍然坚持按《隆中对》的方针办。实际上,在诸葛亮未走出草庐时,《隆中对》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随着时局的变化,《隆中对》所要求的社会条件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完全有必要修改,而刘备却死抱着不放。此外,《隆中对》里说“外结好孙权”,却又赖着借人家的荆州不还,这从道义上说不过去,从根本上危及了联盟大厦的基础。这本身就反映了蜀汉的基本国策同现实的不一致。

对于《隆中对》的后期战略,田余庆有其独特

的见解。他认为,《隆中对》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坚定的追求。然而,刘备却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他没有军事才能,政治声誉也不是太好;其“帝室之胄”的身分,竞争者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都有,刘备并不显著。最终夺取荆、益二州,靠的不是帝胄身分,而是权诈和对手的愚昧和软弱。田先生尤其提到的是,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在长时间内,诸葛亮都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诸葛亮也没有参与其间。诸葛亮职责所寄,不过于荆州“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租赋以充军实”,^{[5]卷35 915}以及入益州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而已。^{[5]卷35 916}此外,对于夺取益州,田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说刘备在荆州占有地盘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一步的实现,那么进据益州就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二步的实现。但是诸葛亮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夺取益州之后,《隆中对》的进取就达到了极限,此后的任务,就是怎么抱住夺取的地盘而不是开拓。因为益州这个地方,受地理位置和财力、人力、军力所限,是很难图境外发展的,尤其是在益州外部有重兵把守时,出秦岭的几率几乎为零。刘备进入益州后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他只能善保边境、经营益州,所谓兴复汉室,已是遥不可及了。

三、“天下有变”的实质及局限

前文所论,主要是《隆中对》主旨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我们这里换一视角,集中讨论《隆中对》后期战略的环境,即“天下有变”。

“天下有变”出现于《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中,是宛洛、秦川二策的触发条件。“汉室可兴”的前提是宛洛、秦川二策能够实现,而实现此二策的背景则是“天下有变”。只有“天下有变”,才能进行北伐。这种变,是一种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换句话说,诸葛亮作《隆中对》时,已经预测到某种事件的发生,并认为该事件是宛洛、秦川二策的根本。

首先讨论何为“天下”。汉代士人对“天下”的看法,有同有异。仅就东汉而论,士人对公羊学

的尊崇乃是一以贯之的,^[6]进而对“天下”的看法也就有某种连续性。要之,公羊家所谓“天下”,乃是基于汉帝国视野范围之“世界”与汉帝国政治控制范围之“国家”的合一体。前者即董仲舒所谓“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7]26}以“天下”与“古今”相对应,分别作为空间与时间的极限;后者即董仲舒所谓“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诸侯得以大乱之说”,^{[7]142}中之“天下”,是政权的代称。无论哪一种,在空间上的范围都是类似的,即汉帝国所辖范围。

然而诸葛亮的“天下”似乎另有所指,比上述范围要小得多。诸葛亮本人的天下观未见记载,当与时人并无二致,不仅包括曹操所掌握的中原地区,还包括汉朝故地、现在为孙氏掌握的江东。因而后来孙权称帝后遣使来蜀汉,敦睦盟好,诸葛亮评论此事为: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5]卷35 924}

视孙权乃不为“国家”所容之“僭逆”,意即孙权乃汉帝国政治控制范围之内一势力也。可见,诸葛亮的“天下”,也包括江东孙氏。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对抗者,是曹操而不是孙氏;刘备复兴汉室,所敌对的是中原地区的曹操势力,其举措也都是针对曹操的。从诸葛亮强调“箪食壶浆”情景来看,他并不认为汉室复兴是刀光剑影,而是收纳亡叛、天下归顺。因而,也只有曹操势力瓦解、中原鼎沸,才能令这一愿景达成;否则,以曹操实力之强,中原地区慑于曹操之威,归顺云云自属空谈。事实上,诸葛亮对于孙氏割据江东、抗拒汉朝正统之事,除了上述道义指责之外,并无更多表现,尤其不见在为政举措中针对孙氏。非但如此,在孙权称帝一事上,他还主张不计较孙权之“僭逆”行为而维持双方的盟好关系。这与诸葛亮对曹魏“僭逆”行为的瞩目不同。因而,诸葛亮此处“天下”之所指不包括江东孙氏是有根据的。换句话说,“天下有变”,其所指应该是曹操势力内部出现动乱,中原再度陷入混乱,如此一来,宛洛、秦川二策才能实现。

那么,诸葛亮认为曹操势力内部会有何“变”

呢?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士人群体的叛乱。东汉时期,南阳是文化异常发达、士人活动异常频繁的地区。与明帝、安帝年间不同的是,东汉末年,颍、汝、南阳士人的学术成就逐渐被名誉清议之风掩盖了,士人之间的交往和议论成为他们主要的事迹。唐长孺在《清谈与清议》一文中着重指出,以汝南之“月旦评”为代表的汉末清谈,带有浓重的“人伦臧否”特色。^[8]在这一情况下,南阳士人“慕名”而动,以博取政治及社会地位,名士的政治活动明显增多了。^[9]而曹操裁抑士人,重视功能之士,反对名士浮华清议之风,其“思想和政策,一般都带有打击大族的特点”。^[10]东汉后期的名士多半来自大族,因而在曹操势力进入南阳以后,势必与当地盘根错节的名士在政治上产生抵触,甚至有可能出现对立。

事实上,曹操势力内部由于与士人的关系而发生叛乱的事例,此前就已经有过:

(边让)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

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文多遗失。^{[11]卷80,2460}

田余庆的《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中就此考辨,以为《后汉书》误系此事于建安年间,实应为兴平元年。他进而提出,吕布攻击濮阳,兖州州郡纷纷叛曹操而降吕布,原因正在于此。^[10]陈琳为袁绍作讨曹操的檄文,谓曹操杀边让,“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5]卷6,197}

边让的死并没有让曹操停止杀名士的脚步。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杀名士孔融。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孔融在朝廷有着相当高的威望。由于看不起出身不好的曹操,他多次刁难曹操,特别是在官渡之战时,他在朝廷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

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5]卷10,314}

对此,荀彧进行了驳斥,让孔融无言以对。后来孔融上书朝廷,提出应该按照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

之内不封侯。对此,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11]卷70,2272}但由于孔融“名重天下”,^{[11]卷70,2272}所以曹操“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11]卷70,2272}不过,曹操已动了杀心,并很快就找到了机会。在用兵荆州之前,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并在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5]卷12,373}不仅从肉体上消灭了他,还从精神上消灭了他。

之后,曹操又杀了名士崔琰。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5]卷12,369}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他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曹操曾赞他“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5]卷12,368}但崔琰仍然没有逃出曹操的魔掌,曹操最终还是逼他自杀了。陈寿说崔琰之死“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5]卷12,370}当世之人也认为崔琰死得很冤。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呢?对此,田余庆在《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中指出,曹操作魏王的时候,崔琰非常不满,并在书信中“傲世怨谤”、“意指不逊”,自绝于曹操,走上了非死不可的道路。^[10]可见,士人的身份及反对曹操当魏王是崔琰最终被杀的根本原因。此前,曹操的首席谋臣,也是士人团体代表的荀彧,因为反对曹操当魏公而被曹操逼死。由此可见,曹操并不信任士人团体。他和士人团体有矛盾,除了士人瞧不起他的出身,还因士人团体反对他独揽大权;而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也侵犯了士人团体的利益。因此,曹操不得不小心防范他们,甚至对他们动刀。

针对朝廷众臣让他放权的问题,曹操曾在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发布了一道教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也叫《述志令》。教令中,曹操回顾了自己做官的历程,阐述了他当时的人生理想,并用历史典故和自己的想法对独揽大权作出了解释,最后又强调了自己绝对不会交出权力和职务。尽管曹操写得洋洋洒洒,直抒胸臆,却并没有让朝廷中人,特别是那些士人信服。相反,反对他的人更多了。由于曹操的大本营是在朝廷,不像刘备、孙权那样有自己独立的根据地,导致朝廷里反对他的人势力很大。为了加紧对最高权力的攫取和

控制,曹操开始自封魏公,进而封魏王,从而控制了整个朝廷。对于反对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名士,曹操有选择地进行杀戮,弄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这就是曹操势力内部出现的“变”。

除了与士人群体的矛盾,曹操势力内部还会出现何“变”呢?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关中诸将也是曹操的后患。消灭袁绍统一北方后,西边的马超、韩遂就成了曹操后方最大的威胁。在周瑜反驳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并向孙权阐述曹操南征的弊端时,就说“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5]卷54,1261}认为马超、韩遂能给曹操带来一定的威胁。既然周瑜想到了这一点,诸葛亮同样也会想到,并将其作为“天下有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曹操还是兵不血刃就破了他们,消除了这个后患。

而在曹操的晚年,内部就爆发了一些叛乱。建安二十三年(218),金祿、耿纪谋反。第二年,又发生了三起谋反案:邺城魏讽谋反案、宛城侯音谋反案和陆浑孙狼谋反案。其中,孙狼谋反之后向南投奔了关羽,使关羽威震中原,这直接让曹操有了迁都的想法。虽然这三起叛乱都被曹操平定了,但也给其势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综上所述,在诸葛亮提出《隆中对》的前前后后,曹操势力内部确有“变”的迹象,证明了诸葛亮的判断比较准确。可诸葛亮低估了曹操的实力,他把“天下有变”看成了必然,没有考虑到不变的可能性:曹操的强势,使内部一直保持着稳定,直到关羽失了荆州也没有“变”的迹象。诸葛亮以偏概全,过高地估计了南阳一地的动荡情况,以南阳一地臆测天下,当是误判的主要原因。

诸葛亮本人和士人关系又怎样呢?就诸葛亮本人而言,他似乎并无明显的学术贡献。《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

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5]卷35,911}

汉代学术以章句为要,诸葛亮属“观其大略”而非

“务于精熟”,其间的微妙差异,不妨认为是陈寿对诸葛亮无学的委婉批评。后人辑《诸葛亮集》,也未见诸葛亮有学术成就。但诸葛亮所交往者,则率多名士。上述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人俱有名,而且“务于精熟”,均有儒学根底。诸葛亮既然出入名士之间,则南阳一带曹操势力与名士对立之情状,他应该是熟知的。仅就史籍所至而言,曹操势力的影响,只有这个最为接近诸葛亮的生活,而诸葛亮对曹操势力的理解,最为突出者也应该在此。

诸葛亮“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5]卷35,920}他在南阳隐居本是避乱之行,原非待时而动之策。他的交游面,在士人麋集的颍、汝一带,也算不上宽。自己无学术,又无交游之资,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诸葛亮当时并无广收天下消息的动机与可能,其《隆中对》大约仅仅是根据身边消息而论的。在消息闭塞的古代,要诸葛亮在短期内从避乱隐居的状态骤然得悉天下变故,未尝强人所难。总之,仅就诸葛亮个人经历着眼,所谓“变”应该是指士大夫的叛乱。

明了了上述事实,诸葛亮对于“天下有变”的估测,其偏颇之处就可以想见了。东汉末年,南阳一带有非常剧烈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初平二年(192)到兴平二年(195)之间,关中流入荆州北部就多达十万余户,这些人都必须经过南阳;而到了建安年间,流民又纷纷返回关中。这种剧烈的人口流动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可以想见。诸葛亮生活在南阳,对这种冲击不会一无所知。联系到社会秩序的剧变,诸葛亮将曹操势力在南阳地区受到抵触的状况,理解为“天下有变”的征兆,也就不难解释了。然而事实上,他所期盼的“天下有变”却并未发生。诸葛亮入蜀以后,未见对中原内变之事再加阐述,想是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失误。郝光陆曾经论及“天下有变”,以为此“变”与历次北伐相对应,诸葛亮每次北伐,都是看到了曹氏内部之“变”而起,如兵力空虚、边将叛降等。^[12]这一观点既没有考虑诸葛亮作《隆中对》时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切合诸葛亮前后心理的变化。诸葛亮作《隆中对》时,目光所及仅为南阳一地,绝

无准确预测曹氏政权具体兵力调动的能力,故郝氏之论并不符合诸葛亮的生活环境;而后一点就要麻烦得多,本文将在最后一节论及。

四、“跨有荆、益”不成与北伐无功

《隆中对》最终没有实现,包括两方面的失败“跨有荆、益”落空与北伐无功。前面说过,田余庆认为刘备没有对《隆中对》太重视,没有把诸葛亮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此话有理。从赤壁之战到刘备永安托孤之间,诸葛亮未予决策,仅是在处理刘备的日常政务,王夫之《读通鉴论》谓刘备“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13]刘备在夺取益州、平分荆州后,割据一方、成就霸业成为其目标,即只想实现《隆中对》的最低纲领,而放弃了《隆中对》的最高纲领。因此,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刘备就默许了。而关羽刚愎自用,骄傲自满,好大喜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错再错,最终导致荆州失守。荆州的丢失是关羽和刘备的共同责任。

诸葛亮不劝阻关羽与刘备东进,乃是因为其时诸葛亮并不为刘备信任。夷陵之战后,诸葛亮见蜀军惨败之状,有如下之论: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5]卷37,962}

诸葛亮如此评价法正,可以想见法正在刘备幕府地位之高;另一方面,亦可反证诸葛亮当时仍是人微言轻。直到刘备死时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才彻底掌握了蜀汉的大权。

从开始治理蜀国到逝世,间隔十一年,诸葛亮进行了多次北伐,却都没有成功。当时的形势,也注定了其北伐不可能成功。田余庆提到,由于地理原因,益州为一坐守之佳地,而非进取之地。本文赞同田先生的这一看法,同时认为北方曹氏势力日渐稳固,已不可能被推翻,这是诸葛亮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受汉献帝禅,建立了曹魏政权。稍前,曹丕用陈群之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并使之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至此,曹氏与士人之间的对立得到了调和,曹魏政权的不稳定因素隐伏了下来。这又回到了前

文提到的“天下有变”问题。当曹氏父子势力内部稳定之时,北伐的困难是很大的。

此外,诸葛亮不是将略之才,这是其北伐失败的短期原因。《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得很清楚:

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5]卷35,930}

既然如此,为什么诸葛亮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呢?从个人角度而言,诸葛亮早年似乎颇有理想主义者的风范。《三国志》谓诸葛亮“独得其大略”,而不“务于精熟”,可见其人志不在小。后来与刘备所谈之《隆中对》里,涉及的内容皆是经略天下的帝王术,而非简单的治国方略,更非儒生讲经之语。以上两点,足以说明诸葛亮隐居草庐之时,确实高屋建瓴,有一匡天下的抱负。但是这种大气的理想主义性格到晚年似乎凋零了,变成了事必躬亲、谨小慎微。观《诸葛亮集》诸文章,所谈多为具体而微的政事,至于像《隆中对》那样高瞻远瞩的构思,则完全无处可寻。能够为这种说法佐证的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暴露出的苛细与琐碎:

亮使至,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5]卷35,926}

从当初的“独得其大略”到晚年的“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这是诸葛亮前后性格的巨大变化在思想上必然有的反应。进而,诸葛亮北伐与《隆中对》中的北伐虽然都是对曹氏势力的军事对抗行为,但是二者所反映的想法却是不同的,后者是理想主义的实践,而前者就要复杂、沉重、艰难得多。田余庆认定诸葛亮北伐乃是“以攻为守”之策,^[3]本文同意这种看法;同时认为,从理想化到“以攻为守”之间的转换,就是《隆中对》与入蜀后诸葛亮北伐策略之间的变化,二者在时间上是同一的。

此外,蜀汉政权内部“旧人”与“新人”的对立,也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因素,而北伐则是消弭内

争的重要手段。

有了这一背景,诸葛亮北伐便似乎有了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意味。而《隆中对》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分别由宛洛、秦川北伐,会师中原的一番构思,至此也徒留“糜军”于祁山之实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所谓“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依赖的是“天下有变”,即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叛乱这一不可靠的假设。诸葛亮对“天下有变”一事认识的失误,加上他晚年性格的重大变化,使得《隆中对》最终没能实现。

参考文献:

- [1]尹韵公.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J].文史哲,1981(5):37-42.
- [2]朱大渭.《隆中对》与夷陵之战[J].江汉学报,1962(9):25-31.
- [3]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J].历史研究,1989(5):45-60.
- [4]杨德炳.《隆中对》“跨有荆益”得失再评说[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86-92.
- [5]陈寿.三国志:卷35[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99-445.
- [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76-284.
- [9]陈雁.东汉魏晋时期颖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J].文史哲,2000(1):71-75.
- [10]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5-162.
-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郝光陆.“天下有变”析[J].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30-32.
- [1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5.

“Dominating Jingzhou and Yizhou Prefectures” and “Waiting for Future Upheavals”: An Analysis of Zhuge Liang’s Strategic Mistakes in *Dialogue in Longzhong*

YU Tian-Yu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Dialogue in Longzhong*, Zhuge liang proposes a two-step strategy for Liu Bei: the first step is to take the Jingzhou and Yizhou Prefectures, and the second to capture Nanyang, Luoyang and all the central areas to the north of the Qingling Mountain. However, the strategy itself is problematic. On the one hand, the first step proves hard to accomplish due to Sun Quan’s (182 – 252) strategic intention regarding Jingzhou, and the “domination of Jingzhou and Yizhou Prefectures” is aborted as a result of Liu Bei’s contentedness with his separatist regime, Guan Yu’s (? – 220) recklessness and Zhuge Liang’s minor influences in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ond step relies exclusively on “future upheavals” by which Zhuge means the revolts possibly taking place in Cao Cao’s (155 – 220) force, but, being unable to produce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that, he later never clings to it, and worse, his character undergoes vicissitudes during his later years; this means that the second step is doomed to failure whether objectively or subjectively.

Key words: *Dialogue in Longzhong*; Zhuge Liang (181 – 234); Liu Bei (161 – 223); Nanyang; strategy

(责任编辑 吴波)